

序

禹 舜

湖南方志界会以欣慰的心情记住1990年。这是全省地方志开始大出成果的一年，也是方志理论研究蓬勃发展的一年。已出版的13部省志的分志、8部县市志证明了这一点，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湖南方志文集》也证明了这一点。

这本文集，不包括地方志学会1990年学术年会收到的全部论文，更没有选入1990年省内外地方志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文集里的41篇文章，只不过是全省方志理论研究成果的很小一部分。这数量很小的一部分文章，却代表了湖南方志界1990年方志理论研究的水平。也许把这些文章的某一篇孤立起来看，并不多么深刻，但把它们合起来看，读者自然会感受到文集在理论上所达到的高度。

读过收在这本文集里的文章，人们首先得到的印象将是研究领域的广阔。作者们从编纂思想、编纂内容到编纂方法无不涉及。这种情况，反映了实践对理论的呼唤，也反映了理论研究者自觉为实践服务。去年，全省各级志书大多进入了编纂阶段，遇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迫切需要从理论上加以解决；同时，数年编纂新方志的实践，使修志工作者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全省热心方志理论研究的同志越来越多，从实践中总结、探索新方志学科理论的学术空气日渐浓厚。这两者结合，便出现了当今方志理论研究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便有了这本文集研究领域广阔的新局面。文集中论文的主题和观点，有不少都是非常新鲜的，在

以前地方志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和我们编辑的第一本《湖南方志文集》中都不曾接触或很少接触，虽然还不能说它们解决了修志实践中所有的问题，但至少是在相当广阔的程度上回答了修志工作者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其次这本文集的理论观点直接衍生于修志实践经验，其理论来自实践而又高于实践，是实践经验的升华，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实践出真知。文集中论文的作者都是修志工作者，他们在编纂地方志的过程中，曾为碰到的各种新问题呕心沥血，绞尽脑汁，不断研究，不断探索，在开拓前进中积累了心得体会。这些论文就是他们在总结新鲜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理论概括。尽管这些论文经验层次的结论还占有相当的比例，但比那种间接的经验性、推论性的理论要实际得多，有用得多。修志在我国虽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旧的方志理论也著述宏富，但由于时代的变迁，旧的方志理论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新方志编纂的需要，因此，需要在总结前人学说的基础上，总结新方志编纂的实践经验，探索新方志编纂的规律。这本文集的作者们正是遵循了这种研究方向，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但有力地指导了新方志编纂实践，同时为建立系统的新方志学，提供和积累了有价值的资料。

还应该大书一笔的，是论文的作者绝大多数都是新人。有经验的修志工作者如翟光、熊耀才、唐俊贤等同志的论文固然论述深刻，近年涌现的方志新人的论文也不泛智慧的光芒，如盛树森、祝自鸣、杨志强等同志的论文。这些论文都相当机敏地提出并相当深刻地回答了编纂工作中的重要问题。有这样的方志新人满腔热情地从事方志理论研究，新方志学的学术研究无疑地会呈现出蓬蓬勃勃的新气象的。

本届修志工作者任重道远。尽管我们在理论研究上取得了很大成绩，有了丰硕的成果，但丝毫也不能满足。要克服方志无学，不重视理论研究的错误思想，要转变不愿付出艰辛劳动，不

动脑、不动笔，无所作为的消极态度。新的实践应该产生新的理论。我们不但要编纂出社会主义时期高质量的新方志，而且要建造起新方志学的理论殿堂。我们要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致力于方志学体系的系统化、学科化研究。一门学科的成熟，标志是其理论体系的形成。方志学要成熟起来，必须形成一个有理论起点、有逻辑联系、经严密论证、受实践检验的理论体系，要具备在更高层次上正确指导新方志编纂的功能，要能在自己的理论范畴尽可能多的解释各种现象，为其寻找理论根据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只要我们端正认识，明确方志理论研究的方向，就一定能达到目的。

我的这篇不算序言的序言，说的多是一些祝愿的话，最后，但愿这一本文集，成为新方志学理论研究的繁荣年代的一个序言。

1991年4月8日于德雅村

目 录

序	禹 舜
修志必须有明确的目的	翟 光 (1)
确保志书政治质量需要掌握的几个问题	黄远炽 (10)
论方志与政治的关系	曹建英 宋毓培 (17)
明确修志目的 提高志书质量	胡嘉楣 (27)
关于志书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和作用的几点浅见	朱汉兴 (33)
试谈衡量志书质量的标准	彭光华 谷志旺 (40)
目前“政务志”编纂中的几个问题	熊耀才 (44)
浅议志稿删繁补要问题	
——兼谈主编《湖南省志·科学技术志》的一点体会	姚德喜 喻志均 (51)
怎样编纂由县发展而来的城市的志书	何培金 (58)
编写党政《重大活动》几个问题的探讨	肖贤伦 (64)
政治类志稿编写探微	李相邠 (73)
试论《苏区志》的编纂	吴定邦 (86)
经济志中应注意政治性内容的记述	郑德明 (93)
地情研究与地区志地方特色之我见	曾维亮 (101)
地区志编纂难点浅议	邹文程 (111)
民族地区志稿体现民族特色应注重其多层次性和全方位性	刘仁民 (118)
概述浅谈	阙子城 (125)
试论地方志“概述”撰写中的两种关系	叶荣开 (130)

“述而不作”辨·····	唐俊贤 (135)
市管县市志处理原市地县三者关系之管见·····	刘弼漠 (144)
行政区划相关的同级县市志书内容记述问题浅析 ·····	杨志强 (151)
新编地方志应正确记述失误·····	金 云 (157)
全面理解失误 认真记好失误·····	胡松凡 (166)
新方志反映历史经验教训胜议·····	祝自鸣 (173)
要理直气壮地提倡秉笔直书 存真求实·····	尹敬中 (182)
新编地方志因事系人小议·····	王甫成 卜友才 (186)
以事系人浅见·····	蔡怡光 (191)
志书竖写的再思考·····	盛树森 (199)
志书突出特点琐议·····	熊汉钧 (205)
修志要环环突出地方特色·····	孙哲生 (212)
核实资料 消灭差错·····	何中安 (218)
试谈增强志书可读性的途径·····	周泽仁 (224)
浅谈县志主编的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	刘永珍 (232)
试论县志总纂的重要性·····	许梓元 (236)
开好志稿评议会的探讨·····	张振莘 (242)
刍议新方志稿的审查·····	周光烈 (246)
论志书语言美·····	柳涌鸣 (253)
小议现代语体文在新方志溯源中的运用·····	杨文国 (262)
如何在志稿中出现与志体相悖的文体·····	任石林 (267)
方言志要记述一方语言的完整体系·····	杨文基 (274)
谈民俗志中对传统习俗的继承和批判·····	黄生钧 (281)

修志必须有明确的目的

翟 光

修志要不要有明确的目的，这是当前方志界颇有争议的一个问题。有的人反对修志的目的性，他们认为，“强调修志目的，难免不按主观意图剪裁史料，很难做到实事求是”。有的人虽承认修志要有目的，但泛论“资治、教育、存史”，或以“存史”为修志的主要目的，目的性仍不很明确。由于修志目的不明，编纂出来的志书便只止于分门别类地记载事业的历史沿革，介绍一些地方风物，等而下之者则只是罗列一些资料，记下几笔流水帐。这样的志书作用究竟有多大？殊令人怀疑。

为了提高志书质量，修志必须有明确的目的。目的明，才知道取舍资料的方向与要求，才知道安排记载的详略，也才能使志书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下面谈谈与此有关的几个问题，它们是：
①历来修志都有一定的目的；②“存史”不是修志的主要目的；
③“资治”与“教育”的目的还须具体化；④新志纂修目的与实事求是精神的一致性。

一、历来修志都有一定的目的

修志在我国文化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文化建设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服务的，修志自不例外。历代统治者都把志书作为“辅治之书”，要求志书“有裨风教”。这就说明，修志不是什么人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有它一定的目的性。翻开历代旧志序言，往往能见到对修志目的的明白阐述。较早者

如南宋宝庆《四明志·罗藩序》说：“欲知政化之先后，必观学校之兴废，欲知用度之赢缩，必观财货之源流；观风俗之盛衰，则思谨身率先，观山川之流峙，则思为民兴利。事事观之，事事有益”。较近者如清同治《攸县志·序》要求“后之览者，考吏治之贤否，民风之厚薄，用以审知乎盛衰治乱之由，而深求乎化导整齐之道”。光绪《应城县志·序》揭示该志宗旨在“备政治之得失，而垂为法戒”，“推求往迹，酌救时宜”。民国二十四年《上海县志·序》指出撰修该志，在于“视以往之因革，鉴得失之轍軒。后之寻求治理者，庶乎资所借鉴，岂徒徵文考献而已”。

总之，历代修志，都有一定的目的，至少是为了替当时统治阶级歌功颂德，毫无目的修志的现象是没有的。

二、“存史”不是修志的主要目的

我们纂修新方志，自然也有它的目的，不过尚在争论。这就影响对修志目的的明确认定，也就影响志书的质量。前响，方志界有人把志书的功能概括为“资治、教育、存史”三项，这是不错的。由于志书的功能与修志目的密切相关，于是争论从此而起，有人认定“存史”是修志的主要目的。他们从志书的资料性出发，认为缺乏资料，“资治”与“教育”皆成空话；有了资料，就可以达到“资治”与“教育”的目的。有人则认为“存史”不过是达到“资治”与“教育”的手段，“资治”与“教育”才是修志的主要目的。我是赞成后一种意见的。

考地方的历史资料，真是汗牛充栋。除各省市（地区）县有档案馆储藏外，各职能部门，基层单位一般都建有资料室或档案室，用以保存资料。这样众多的资料，能录入志书的，不过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各地修志所收集的文字与口头资料载入志书

者，往往也不及其中的十分之一。这录入志书的极少部分资料，必是经过选择的。选择的标准是什么呢？那就要看它们资治与教育作用的大小来定。也就是说，修志是根据资治与教育这样的目的去收集与选录资料，不是为“存史”而选录资料的。如果把“存史”看作修志的主要目的，抱着“存了史就可以起资治和教育作用”这样的见解去修志，就会漫无目标地收集和辑录资料，其结果就会造成无用的资料多，真能起资治和教育作用的资料少，也会拿不定哪些资料有用，哪些资料无用，从而兼收并蓄，将篇幅拉得很长。这两者可说是当前志书的通病。其源盖出于修志的目的不明确。

我这样说，并无否定志书资料性的意思。资料是修志的基础，离开了资料，就不成其为地方志了。但辑录资料的目的，也就是编纂地方志的目的，必须十分明确，才能以有限的篇幅，保存最有用的资料，提高志书的使用价值。

三、“资治”与“教育”的目的还须具体化

“资治”与“教育”是修志的主要目的，这是不错的。但我认为这样提还过于宽泛。地方志从什么角度去资治？它与馆藏档案及各种资料汇编的资治作用有什么区别？地方志从什么角度向人民进行教育？这届出版的新志书，主要应发挥哪些教育作用？这些问题，都是应该辨明的。

先说“资治”。的确，馆藏档案与各种资料汇编都是资治的。地方志若仅仅用来“存史”备查，其资治作用远不如馆藏档案或资料汇编。但地方志有为馆藏档案及资料汇编所不及的一个优越条件，就是它系统地分门别类地记载了长时期的历史。它虽然只是资料性的著述，不发议论，但可以通过对资料的取舍编排，反映地方各项事业的兴衰起伏过程及其原因，从历史的兴衰

起伏过程及其原因中反映历史的经验教训，而这些历史经验教训，一般是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较能证明其真理性。根据志书的这一特点，它的资治作用，具体说来，主要是向人们提供历史借鉴。这是馆藏档案、资料汇编乃至地方年鉴所难以做到的。

这样的修志目的，并不是我主观生造出来的。历史上编纂较好的志书，大多强调修志的历史借鉴作用。本文第一部分所举的旧志序言，大都可以证明这一点。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也十分强调这一点。他主张仿“班史取延年、贾让诸疏入《河渠志》，贾谊、晁错诸疏入《食货志》之例”，摘取时人对时政的论述，“附入物产、田赋、风俗、地理诸考，以见得失之由，沿革之故”（《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他介绍撰《湖北通志·食货考·田赋》的方法说：“余取赋役全书，布政司总汇之册，登其款数，而采取明人及本朝人所著，财赋利弊奏议详揭，与士大夫私门论撰之属，联络为篇，为文亦不过四五千言，而读者于十一州府数百年间财赋沿革利弊，洞如观火。盖有布政司册以总大数，又有议论以明得失，故文简而事理明也”（《章氏遗书》卷十四《方志略例》一）。民国时期有见识的方志学家象黎锦熙、黄炎培、瞿宣颖等人，都要求方志能“彰因果之效”，也就是要求方志能反映历史经验教训，提供借鉴。因为事业成功或失败的原因，即蕴含着历史经验教训的缘故。上述事例说明，旧时有见识的方志学家，已不满意于地方志仅仅分门别类地辑录一些资料，而要求志书能发挥历史借鉴作用了。

社会主义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依，必须从自身实践中积累经验，因此后人对前人经验教训的吸取，十分重要。虽然党中央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已经或正在总结，但具体到各个地方，情形千差万别，各地仍须不断总结自己因地制宜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利用志书的优越条件，将地方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

验教训记载下来，对后来的建设者无疑大有裨益。

要求志书能发挥历史借鉴作用，首先要做到是非清楚，因果彰明，使读者能从历史的功过得失及其原因中，领悟出哪些是必须遵循的历史经验，哪些是应该记取的历史教训。其次要注意挖掘和记载本地干部和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创造的具体经验和取得的教训。这种经验教训，具有地方性，对地方的社会主义建设借鉴作用较大。要改变许多志书只止于汇报情况，介绍风物的浅薄状态，注意记地方领导机关施政决策的经验教训；各方面行政管理的经验教训；典型工程、企业、事业单位办得好的经验以及失误的教训，还可以记载各行各业先进模范人物创造的新鲜经验。如果志书各篇章都注意反映历史经验教训，则志书的借鉴作用将大为提高，这样的志书，才具有一定的深度和较高的使用价值。

再说“教育”。历代修志，都注重教育作用。封建社会的志书，用大量的篇幅表彰忠臣、孝子、节妇、烈女，无非是要向读者灌输忠孝节义这样的封建道德观念。新方志要向读者进行哪些教育？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与新的道德风尚教育是必要的。但是我以为从这届志书记载的主要内容看，从社会主义阶段的历史需要看，新方志主要应担负向人民进行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的重任。这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从历史需要看，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始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因而对人民进行四项基本原则教育，是社会主义阶段的严重政治任务。新方志是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如果舍弃这一严重的教育任务而单纯去“存史”，是舍本逐末。从这届志书所记载的主要内容看，它一般记载了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这段历史。这段历史本身说明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严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而旧民主革命未能改变中国贫穷落后，备受帝国主义欺凌的状

况，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接着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才使国家走向欣欣向荣的康庄大道。虽然我们曾经有过严重的失误和挫折，但是我们的胜利是伟大的，经济文化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我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这一段历史，充分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真理。我们必须充分利用新方志这一乡土教材，向人民进行生动的四项基本原则教育。

本着进行四项基本原则教育这一目的去记载这段历史与漫无目标地辑录资料其效果是大不一样的。应该肯定，当前一般志稿是反映了旧中国贫穷落后与新中国建设成就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由于修志目的不甚明确，还存在如下一些缺点：①记旧的国家机器，只止于机构、会议加上一点业务，对它们腐朽黑暗的本质揭露不够。记旧时合作事业和救济福利事业，也看不出它们与新社会的有什么本质区别。②记共产党地方组织，也只记机构、会议、人员加上有关党务的记载，看不出中国共产党怎样领导人民改变地方面貌，也看不出共产党的光荣伟大。为了克服这些缺点，建议从下列两方面加强记述：

（一）政治部类增加对民国时期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政府、警察、法院等机构腐朽黑暗的揭露，以显示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十分必要。但对民国时期的政治，应作历史分析：民国初年军阀混战，政治黑暗，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国共合作进行第一次大革命以及抗日战争，国民政府做了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但是在国民党大多数统治时期（包括抗日战争后期），政治是黑暗的，是反共和压迫人民的。要用事实揭露这些时期官吏贪污贿赂成风，军阀、警察、法院镇压人民，鱼肉人民的黑暗面。旧政府也点缀性地办点慈善救济事业，但杯水车薪，而且层层克

扣，劳动人民极少得到实惠，对于这点也是要用事实予以揭露。当然，就是在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个别机构和人物做了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也可如实记载，但那只是支流不是主流，不要把支流当成了主流。

(二) 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记述。⊖要记述共产党地方组织怎样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改变地方面貌的。可设《重大政务活动纪要》或《执政决策纪要》等章节，从地方党组织决策角度记共产党对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领导作用。⊕要记述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可设《党的优良传统》章节，记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事项。第一项主要概括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制订各项政策，采取各项措施（打倒反动派，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关心群众疾苦，举办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事业，农村“五保”，扶贫，国营集体企业实行劳动保险劳动保护等）为人民谋利益；共产党员在民主革命时期英勇牺牲，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模范带头等；第二项主要记共产党员与群众血肉相连，党员干部与群众实行“三同”，向群众学习，倾听群众呼声等优良事迹；第三项主要记党组织有错必纠，勇于改正错误。近期来党内出现了一些不良作风甚至是腐败现象，但从党的整个历史时期和党的总体上看，那究竟是支流，不是主流，而且党正在采取措施进行纠正。记述党的优良传统，可以使之发扬光大，可以教育党员和人民。

四、新志纂修目的与实事求是精神的一致性

目的属主观意向，抱着主观意向去修志，能否做到实事求是？这在旧志是难以做到的，在新志是可以做到而且必须做到的。旧志为少数剥削者服务，其中虽然保存了一些真实有用的资料，但它要掩盖剥削真象，在全体上不可能实事求是。新方志与旧

志有本质区别，它是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按照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进行的。虽然我们在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具体规律过程中曾走过许多弯路，违背过客观规律，但我们总的方向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新方志记载历史经验教训，就是为了反映地方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只有实事求是地编纂志书，才能使所记载的历史经验教训具有真理性，才有借鉴价值。所以实事求是与“资治”的具体目的是是一致的。从进行四项基本原则教育这一目的说，前述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这段历史，正说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了中国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出路。清末和民国的历史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除了社会主义，除了共产党，没有任何途径任何力量能够使中国走上繁荣富强的康庄大道。所以从“教育”的具体目的来说，只有实事求是地将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展现在读者眼前，志书才能使读者领悟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同时，我们修志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它指导我们坚持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反对主观和客观相分裂。我们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一定能够将修志目的与实事求是精神统一起来。

然而，由于修志者的水平和某些条件的限制，要使修志目的与实事求是精神统一起来，还有一些具体困难须待克服。

第一，修志者认识上的局限。除了马列主义水平有待提高，对地情的认识有待深化外，目前还有其他的一些思想障碍妨碍二者的统一。一是误解“实事求是”，以为实事求是就是客观主义地有闻必录。这样就使志书缺乏主旨，缺乏重点，开中药铺似的，当归川芎，样样有点，而说明问题的有用的资料则不多。有的以为“实事求是”就是要肯定旧社会有可取之处，而忽略对其黑暗面的充分揭露。有的为了说明本地“人杰地灵”，记旧时官

吏则只记其中的清官，极少披露旧官吏搜刮人民血汗的本质。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不正是对旧官吏搜刮本质的写照吗？二是不赞成志书要反映历史经验教训，认为人的认识是变化的，今天认定是历史经验教训的，明天不一定作这样的认定。不错，人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1958年大家都喊“大跃进万岁”，现在则认为“大跃进”有成绩，也有严重的失误。但作为传世之作的地方志来说，它记载的是经过相当长时期实践检验的历史。修志是人们对历史进行事后冷静的思考，不象事情发生的当时，人们对之还难于认识清楚。何况我们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有生产力标准这把尺子，还有党中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决议作准绳，我们是可以对地方历史作出客观公正的判断的。

第二，资料上的局限。我们修志，常常遇到资料不足的困难。但对于民国时期和新中国几十年的历史来说，主要资料是不难找到的。问题是，我们的修志目的不明确，未能根据一定的修志目的，有意识地收集和深挖资料，因而为资料所左右，手头有什么资料就辑录什么资料，更无论提高其借鉴作用和教育作用了。

第三，外界的干扰。修志可能会遇到地方人士的请托或干涉，使修志难于达到预期的目的，也难于实事求是。但这在各地只是少数现象。作为地方党组织这一集体来说，一般是能够实事求是的。只要依靠党组织的领导，就能够既达到修志目的，又做到实事求是。

由此可见，以上三方面的困难，经过努力是可以克服的。

总结本文的主旨，就是要求改变修志时漫无目标地辑录资料的现象，明确修志目的。本届修志，主要目的在于力求反映地方事业发展的经验教训，向读者提供历史借鉴，同时进行四项基本原则教育。这一目的，是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和志书本身的条件提出来的。只有明确修志的这种目的，才能使编纂出来的志书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确保志书政治质量需要掌握的几个问题

黄远炽

胡乔木同志指出，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修志，做到政治观点正确，是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灵魂，是新旧方志的根本区别。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颁布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湖南省地方志编委会制定的省志编纂方案和编写质量标准，都强调把观点正确、确保志书的政治质量放在首位。《军事志》涉及的政治原则问题、方针政策问题很多，政治敏感性很强，确保志书的政治质量显得尤为重要。这是我们需要切实把握的一个重大问题。

根据上级有关修志指导文件和方志界的论著，要确保志书的政治质量，总的来说，就是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述历史和现状。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既要继续肃清“左”的影响，又要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要坚持毛泽东人民军队、人民战争思想，认真贯彻中央军委一系列重要决定和指示。编写《军事志》除要严格执行地方有关规定、要求外，还要学习运用、参照执行总部编辑《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和《当代中国》丛书军事国防分卷的有关条例、指示。

怎样具体落实编志指导思想和有关要求，保证志书的政治质量？这里仅从我们《军事志》实际内容涉及到的几个问题，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一、要用阶级分析的观点看问题

《军事志》记述的时间跨越旧中国和新中国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制度，记述的对象包括进步的 and 反动的两种不同性质的军队、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种不同性质的战争，有很强的阶级性。我们在篇目结构上，按照“同类相并、类中分性”的原则，在按照不同时期军队的共同事类横排若干篇以后，一般都在第二个层次，按清末、民国、新中国成立以后三个时期设章。“后方勤务”篇因为多属物资、技术方面的工作，阶级性质区别不很明显，第二层次仍按事类横排，然后再依时记述。这样既照顾了志书体例的要求，又可以从总体上做到泾渭分明，不致于混淆两种不同军队的性质。但是，在记述旧式军队时，由于旧社会形成的各种档案资料，往往带有浓厚的阶级偏见，掩盖了事物的阶级实质，我们一定要注意作阶级分析，有批判地揭露旧军队腐朽、反动的本质。比如旧的档案资料记载国民党的清乡、保安团队以及民团组织的职能，都是“维护治安”、“保境安民”等等，我们不仅不能原封不动地抄过来，还要充分揭露它们作为对付共产党、压迫劳动人民，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工具的反动实质。

旧式军队的兵役、训练、管理、政治工作以及后勤保障的某些章程、措施，某些军事人物的治军思想、主张，对我们的军队建设也有可供参考、借鉴的作用，从志书的资治、存史功能考虑，应该有选择地加以记述。但是，第一要注意考证史料和史实是否一致。剥削阶级军队的典章制度尽管写得冠冕堂皇，口号要求尽管说得天花乱坠，有的要求甚至比人民军队还要先进，但是他们的阶级本质决定了不可能完全做到，往往写的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外一套，第二要注意掌握详略适度。适当记述他们某些好的事物，要防止在总体上美化反动军队。从总体上说来，剥削

阶级军队的内部关系都是官兵对立、虐待士兵，外部关系都是军民对立、欺压百姓的，我们要用史实充分揭露这些黑暗的内幕。在国民党兵役法中曾规定所谓“三平”原则，即：“按人口比例平均分配征兵数额，适龄男子不分阶级和贵贱平等履行兵役义务，征兵工作对任何人都应平允办理。”而我们搜集的大量资料说明，国民党的役政充斥着贪脏枉法，敲诈勒逼，强拉硬抓，有钱人逍遥“役”外，贫苦人灾劫难逃，根本没有什么“平均”、“平等”、“平允”可言。

我们《军事志》的概述篇，要简略综述历代湖南地区发生的重大战事，以说明湖南所处的军事地位。记述历代战争要用无产阶级的战争观，区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不同性质。旧的史志往往把农民起义战争、少数民族起义战争称为“叛乱”、“匪患”，对蒙、满等民族统一中国的战争也往往站在大汉族主义的立场加以贬毁，对此，我们要加以纠正。

二、要用历史的观点看问题

社会历史现象是纷纭复杂的，评判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功过是非，都要考虑当时当地的历史条件，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任何把历史简单化的做法，都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我们的《军事志》不列人物传记，军事人物传记都归入了省志《人物志》。但是，记述中要因事系人，还是要写到各个时期的一些人物的。我们不能苛求于古人，尤其对于民国军事人物，对于一些一生多变的人物，对于政治上比较敏感的人物，更要慎重对待。即使是一些和我军作过战的国民党将领，如果他们在参加、指挥辛亥革命战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有功绩，都应当如实地记载，更不用说那些在和平解放湖南中作过贡献的人物了。

对于各个时期的军队也要作历史的分析。清末绿营之对于八